

传统经学的现代诠释

董运庭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传统经学的现代诠释

董运庭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传统经学的现代诠释

董运庭 著

出版: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成都建设北路二段四号)

责任编辑:仁 文

发行: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印刷:北京市朝教印刷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7.25 字数:200千字

版次:1996年5月第一版

印次:2005年10月第二次印刷

书号:ISBN 7-81043-551-5/I·11

定价:1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序

皮朝纲

运庭君的新著《传统经学的现代诠释》即将付梓,他要我写一篇序。此书以它独特的视角、新颖的见解、翔实材料、流畅的文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运庭写出了这样一本富有创见的学术著作,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真正的百科全书,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或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渊藪。西汉以后,孔子和儒家典籍逐渐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和国家法定的经典,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但孔子身前却栖栖遑遑,四处碰壁,他的思想不受当时任何一种政治势力的欢迎。孔子以后,孟子和荀子是儒家学派的两位大师,他们的思想轮廓及其走向却并不一致。儒家的典籍,即所谓“十三经”,本来也不是什么经典,而分别是文学、史学、神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字训诂学等方面的著作,都是古代的史籍和文献。它们成为经典,有一个长期的、人为的、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而实现的加工改造的过程。这种“群经建构”的过程,与儒学被封建政治“选中”而成为官方学说的过程,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如果忽视这种内在联系,仅仅遵循传统的学术研究的路子,执著于文献目录、版本考证,名物训诂的研究,或者仅仅遵循思想史研究的路子,执著于儒家学派的思想演进的研究,都难以在理论上有一种整体的把握和透彻的反省。这部新著的主

要内容,一是从宏观上对中国经学体系建构所作的再思考;二是考释儒家典籍(主要是《易经》、《尚书》、《诗经》、《三礼》和《左传》)的本来面目及其在西汉以后逐步经典化的过程;三是考辨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思想体系的异同及其承传互动的关系模式。通过这些考释和考辨,获得一个文化反思的新思路;凭着这个思路,去重新阐释传统经学,重新思考传统文化,并对若干理论界长期争执不休的问题,作出自己的探索和求解。

运庭在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的观点,我是很欣赏的,即不把文化传统视为已经过去的东西,而视为源于过去、孕育当今、指向未来的东西。近十年来,他的学术视野不断开拓。无论是过去从事古代美学的研究、禅宗思想的研究,还是现在从事传统经学的研究,主要着眼点,都在于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成因,思考传统文化的走向,积淀与现代转型等问题。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学者,他在这些思考中表现出一种探索的勇气和创新的精神。不仅善于思考,重视思辨,在理论上有独具会心的发现,而且注意用翔实材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坚持从丰富的历史资料出发,来对自己所研究的课题进行深入的分析,这种求实的作风,增强了他的论著的科学性。

我作为本书的第一个读者,读后获益匪浅,感受良多,即兴写下了这些文字。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需要作多学科、多层次、多视角的综合研究。古人说:“学海无涯。”衷心希望运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学术领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于四川师大净心斋

目 录

序	皮朝纲(1)
绪论	(1)
一、经部居“四部”之首	(2)
二、封建国家愚妄的决策机制	(5)
三、经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11)

上编 经学体系论

第一章 从“六经”到“十三经”	(19)
一、“经”义溯源	(19)
二、孔子与“六经”	(23)
三、经的扩展与传刻	(27)
第二章 “六经”的经典化过程	(33)
一、史籍先于经典	(33)
二、六艺“折中于夫子”	(37)
三、传、记的形成与变迁	(44)
第三章 经学流派	(51)
一、划分流派上的不同主张	(51)
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	(55)

三、“宋学”的两个层面·····	(60)
四、关于“现代新儒家”·····	(64)

中编 群经建构论

第四章 《周易》:挣扎出来的哲学·····	(69)
一、《周易》本是古代占筮之书·····	(70)
二、古人并不拘泥《周易》筮辞·····	(74)
三、《易传》的两套语言·····	(80)
第五章 《尚书》是一部奇书 ·····	(87)
一、关于《尚书》的来源·····	(87)
二、今、古文《尚书》及其真伪 ·····	(90)
三、关于伪古文《尚书》·····	(94)
第六章 《诗经》学与“诗本义” ·····	(98)
一、“删诗”与“六义” ·····	(99)
二、汉代的“四家诗” ·····	(104)
三、汉以后的《诗经》学 ·····	(111)
第七章 礼:从伦理范畴到政治范畴 ·····	(116)
一、关于《周礼》的若干问题 ·····	(117)
二、关于《仪礼》的若干问题 ·····	(121)
三、关于《礼记》的若干问题 ·····	(126)
第八章 从《左氏春秋》到《左传》 ·····	(133)
一、《左传》的名称 ·····	(134)
二、《左传》的作者 ·····	(137)
三、《左传》与《春秋》 ·····	(142)

下编 孔孟荀略论

第九章 先秦诸子与儒家学派	(149)
一、司马谈论“六家”	(150)
二、刘歆、班固论各家起源	(154)
三、“儒”与原始儒家学派	(159)
第十章 孔子思想再评价的难题与求解	(163)
一、孔子思想性质的认定问题	(163)
二、孔子保守的政治倾向问题	(168)
三、“真孔子”与“假孔子”问题	(172)
第十一章 孔子思想略论	(178)
一、“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	(178)
二、“仁”学思想体系剖析	(183)
三、孔子思想的总体特征	(189)
第十二章 孟子思想略论	(193)
一、孟子的生平和时代	(193)
二、孟子对孔学的继承发展	(197)
三、孟子思想的轮廓与走向	(204)
第十三章 荀子思想略论	(208)
一、新的儒家代表人物	(208)
二、荀学的三个关键	(211)
三、荀子的地位和影响	(219)
后记	(223)

绪 论

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门学科能像经学那样,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学术文化产生如此深远、如此沦肌浹髓的影响。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心理,无论是伦理的,道德的,还是其他观念形态的,无一例外,都与经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经学,慎重一点说,可以追溯到西汉初年,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成为“犹天之不可阶而升”的圣人,六经成为“悬诸日月而不刊”的经典,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身处封建时代的文人学者,只能仰慕其恢宏,惊叹其博雅,只能皓首穷经,孜孜务学并且身体力行,不可能把圣人和六经作为一般的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而加以理性的思考,也不可能回答经学为什么会在中国长期绵延。

纵观中国经学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全部历程,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生、发展与衰亡相始终。注释儒家经典、研究儒家思想的传统经学,既不是纯然的哲学,也不是纯然的史学,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真正的百科全书,是历代封建王朝官方意识形态或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渊藪。这方面的内容,当然不全是精华,不必奉为“国粹”;但也不全是糟粕,不必一律斥之为“劣根”。它植根于中国的土地上,自有其存在的依据与历史的合理性,这也算一点中国国情。一位著名的学人说过:“现代的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新的局面必将展开。然而我们对旧文化的检讨,以同情的了解给予新的评价,也更形重要。”^①这段论,概括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的基本态度。

一、经部居“四部”之首

中国古籍,从《隋书·经籍志》直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向来按经、史、子、集分为四大部类,经部始终位居第一。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经部书籍已达一千七百七十部,两万零四百二十七卷^②,真可谓汗牛充栋,更仆难数。《隋书·经籍志》以前,经部虽无其名,但它的首席地位早已确定,不可动摇。中国古代官修书目最早编定的是西汉末哀帝时(公元前6年—公元前1年)刘歆的《七略》,此书系总括其父刘向所撰《别录》而成。^③据阮孝绪《七录序》:“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次《六艺略》,次《诸子略》,次《诗赋略》,次《兵书略》,次《数术略》,次《方技略》。”^④可知《辑略》为各类总叙,以下分六类著录。《六艺略》著录六经和研究六经的著作,即后来的经部,在六类中居于首位。班固《汉书·艺文志》根据刘歆《七略》编成,删去《辑略》,保留了六略共三十八种的规模和格局。在《汉书·艺文志》中,《六艺略》著录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凡九种,在六大类中仍居首位。到西晋泰始十年(274),荀勖撰《中经新簿》,始创四部分类法,分图书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甲部即经部,著录六艺和小学等书。^⑤东晋初年李充上《四部书目》,仍沿用荀勖的四部分类法,“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⑥。清人钱大昕总结说,由于李充重分四部“而经、史、子、集之次始定”^⑦。南齐元徽元年(473),王俭上《今书七志》,以经典志居首,而次之以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数志、图谱志。^⑧梁普通年间(520—527),阮孝绪撰《七录》,以经典录居首,次之以纪传录、子兵

录、文集录、术技录、佛法录、仙道录。^⑨上述资料足以说明,从西汉直到清代,在中国图书目录中,无论四部分类还是七部分类,也无论名称有怎样的变异,著录儒家经典及其研究著作的经部,始终占据第一位。这个地位不可动摇,也从来没有动摇过。

除经部始终占据首位外,四部中的史部和集部也跟经学密切相关。历代史籍都重视经学,记录了经学的发展。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除《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新、旧《五代史》之外,其余各史均列有《儒林传》或《儒学传》,记载经学家的生平事迹、学术思想和学术著作。三国时期、南北朝时期和五代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乱,经学在文化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有所削弱,但是,即令如此,《三国志·魏书》也有《王肃传》等,为那个时代重要的经学家立了传。二十四史之外,《新元史》和《清史稿》也有《儒林传》。经学,真可谓史不绝书。历代大作家、大诗人的文集,其中也有大量的研究经学的著作。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被称为“七子之冠冕”^⑩,他的诗、赋都很出色,所作《七哀诗》和《登楼赋》,历来受人称道。但王粲在经学上也很有造诣,曾与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论难《尚书》,并有论著收入文集。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记载了他经历的一件事:“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吾初入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崔转为诸儒道之。始将发口,悬见排蹙,云: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这说明,古代大作家的文集也论经书之事,未必只有诗赋铭诔。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都是著名的大作家,他们的文集中都有重要的经学著作。清代刘熙载以《艺概》一书,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艺概》共六卷,除《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之外,还有一卷《经义概》,讨论经学问题。四部之中,相对而言,子部历来地位不高,与封建时代文人的修、齐、治、平关系不大。

因此,范文澜在《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一文的题识中曾说:“‘五四’运动以前二千多年里面,所谓学问,几乎专指经学而言。”^⑩据此我们可以推论,所谓国学,所谓传统文化,其实也几乎专指经学而言。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发展中,先有儒、道互补,后有儒、释、道三教合流。然而,互补也罢,合流也罢,儒家经学始终处于正统和主导地位。中国文化的真正信仰在于儒家学说,而经学,不过是与封建政治相结合的儒家学说而已。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人的宗教意识特别淡薄。梁漱溟称“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为中国文化的“怪点”和一大特征^⑪,事实确实如此。基督教于唐初即传入中国,称为景教,但未能扎根,明清之际又再度传入。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势力颇大。但从总体上看,中国文人大抵并不是正而八经把佛教当作一种神圣的宗教,而是视之作为一种外来的哲学文化,视之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用以填补心灵的空缺,所以佛教在中国被大大地改造了一番,形成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知识分子特别喜欢禅宗,而在下层民间和文化水准较低的上层贵族中流行的佛教,则以“因果报应”为核心,以捐塑佛像、刺血写经、禁欲苦行为主要内容,目的在于乞求保佑,消除祸灾,谈不上什么精神上的信念和信仰。梁漱溟还说:“同一社会而不是同一宗教,最易引起冲突;但像欧洲以及世界各处历史上为宗教争端而演之无数惨剧与长期战祸,在中国独极少见。这里宗教虽多而能相安,甚至相安于一家之中,于一人之身。那末,其宗教意味不是亦就太稀薄了吗?”^⑫事实也确实如此。中国人办丧事,请一拨和尚,再请一拨道士,吹吹打打,各念各的经,谁也不觉得奇怪。这种情况,用西方的宗教信仰的观念来看,简直形同儿戏。西方人一生中的重要阶段,都要进教堂举行庄严的仪式,在宗教上若要改换门庭,那是天大的事。中国人之所以有如此“怪点”,而且见“怪”不怪,关键在于,真正的信念在儒学,骨子里并不深信那些什么教。儒家思想和传统经学的地位,佛教、基督教不能动摇,历史上的五胡乱华,蒙古

人、满清人入主中原也不能改变。孔广森《戴氏遗书序》谓：“北方戎马，不能屏视月之儒；南国浮屠，不能改经天之义”，就是说的这个意思。从现存古籍的各个门类来看，经学著作是数量最多的一个门类。而且，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也形成了以经学为主、特别尊经的特点。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特点，无可回避，别无选择。

二、封建国家愚妄的决策机制

汉代的今文经学家提出“通经致用”的口号，表明经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实际价值。这个口号中的“用”字，特别意味深长。经学有什么实际的用途呢？考诸史籍，可知它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用武之地，即所谓通经致仕与经术治国。

经学成为儒生的利禄之路，是从汉代开始的。汉高祖刘邦戎马倥偬，历经征战而得天下。他本来是很厌恶儒生的。一提儒生，动辄便骂，极其无礼。“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⑭刘邦初即皇位，朝廷没有礼仪。那些和他一块儿起义打天下的哥儿们，对他也很随便。眼看群臣争功酗酒，随意胡闹，他既担心害怕，又束手无策。儒生叔孙通帮他制订了朝廷礼仪，使群臣“莫不震恐肃敬”，“无敢喧哗失礼者”，刘邦于是方悟，他很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⑮刘邦体会到了儒家的那一套对巩固他的统治有作用，于是抬高儒学的政治地位，在他死的前一年，便用太牢祭孔子。不过，光做这样的表面文章显然是不够的，要巩固儒家思想的地位，大兴经学，必须考虑利益驱动的原则，导之以利禄之路。汉文帝时，开始为经学设立博士，当时立于学官者只有《诗经》，以申培、韩婴为博士。景帝时，增补辕固生为博士，六经中仍只有《诗经》立于学官。汉武帝大兴太学，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设《书》、《易》、《礼》、《诗》、《春秋》五经博士。

西汉宣帝时,五经博士扩大为十二家。^⑩到东汉光武帝时,五经博士扩大为十四家:《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书》有欧阳生、夏侯胜、夏侯建三家;《诗》有齐、鲁、韩三家;《礼》有戴德、戴圣二家;《春秋》有严彭祖、颜安乐二家。^⑪当博士自然有它的好处,那好处,就是踏上了通往权力中枢的终南捷径。在“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汉武帝时代,公孙弘以治《春秋》,白衣而为天子三公(当了丞相),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汉元帝尤好儒生,当大官的就更多。韦贤治《鲁诗》,当了丞相。匡衡治《齐诗》,当了丞相。贡禹治《齐诗》,当了御史大夫。薛广德治《鲁诗》,也当了御史大夫。于是,有所谓“宰相须用读书人”的说法。社会的价值观念变了,“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不仅博士本人,而且博士弟子也有利可图。武帝时,为博士设置弟子五十人,终身免除徭役赋税。昭帝时增至百人。宣帝末年,又倍增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终身免除徭役赋税。这样,由于国家政治权力的诱惑与推动,经学的势力越来越大。《汉书·儒林传》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正因为如此,经学越搞越繁琐。

由于封建统治者提倡通经致用、以经术治国,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上,朝廷诏令和群臣奏议皆援引经义为依据,政治思路完全取决于经学的理论模式。这种不科学的“本本主义”的决策机制推向极端,在当时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就出现了种种愚蠢虚妄的怪现象。不仅如此,后人还穿凿附会,以讹传讹,引出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误解。直到今天,有人在述评儒学对于“东亚四小龙”经济腾飞的作用时,还在重弹这些以讹传讹的老调。对此,不可不加以辨析。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怪现象,即所谓“治一经得一经之益”,西汉时期最为典型。前人视之为经学的功绩,是带着赞同、勉

怀的口气来陈述的。皮锡瑞《经学历史》卷三《经学昌明时代》这样说：

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诂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⑮

皮锡瑞是今文经学家，在今、古文学的论争中，不可能完全摒除门户之见，对今文经学的立场总有偏袒，所以他特别推崇“武、宣之间，经学大昌，纯正不杂”。这一层我们暂且不谈，对他所列举的经学“奇迹”的几个范例，可以一一考查。

第一，“以《禹贡》治河”，这是指平当的事。《汉书·平当传》：“当以经明《禹贡》，使行河，为骑都尉，领河堤。”颜师古注：“《尚书·禹贡》载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当明此经，故使行河也。”河，指黄河。因为《禹贡》记载了大禹治河的情形，又因为平当精通《尚书》中的这一篇文章，所以就把治河的重任交付给他。那么，平当受此重任，他的具体举措如何呢？《汉书·沟洫志》：“哀帝初，平当使领河堤，奏言：‘九河今皆置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雍塞之文。’”这就是平当的治河纲领。这种举措显然是生硬搬套《禹贡》的教条，而不是从治河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所以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提出批评：“当言可谓明经矣，然与后世筑堤束水、借水刷沙情势又自不同。”

第二，“以《洪范》察变”，这是指夏侯胜和刘向的事。《汉书·夏侯胜传》：“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亚舆前诂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是时光（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世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言：‘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大

惊,以此益重经术士。”又,《汉书·刘向传》:“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二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洪范》是《尚书》中的另一篇文章,记载武王克商以后,为了长治久安,相继访问了殷纣时的重臣,其中有纣王的叔父箕子,向他请教治国之道,箕子为武王讲解了一通“五行阴阳休咎之应”的道理。这些玄虚空洞的道理,并不能洞察复杂的政局变化。上述夏侯胜、刘向两例,只能说他们怀着对政治的忧虑,仿照箕子之法,借用天灾变异的情况,向统治者提出了某些告诫而已。所谓“以《洪范》察变”,纯属无稽之谈。

第三,“以《春秋》决狱”,这是指董仲舒的事。《后汉书·应劭传》:“胶西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汉书·艺文志》的《春秋类》著录了《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⑨,可以印证。不以事实为依据,也不以当时的法律为准绳,一味按《春秋》所载历史事例作类比推理,随意断案,凭想当然,不仅荒唐,而且也直接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酷吏张汤随意杀人张目。董仲舒身居显位率先垂范,起而效尤者无计其数,在汉代造成了一股教条主义的政治空气。皮锡瑞《经学历史》卷四《经学极盛时代》对此风作了记载:“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一时循吏多能推明经意,移易风化,号为以经术饰吏事。”^⑩

第四,“以《三百五篇》当谏书”,这是指王式的事。《汉书·儒林传》:“(王)式为昌邑王师。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乱废。昌邑王群臣皆下狱诛,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以数谏减死论。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无谏书?’式对曰:‘臣以《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

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无谏书。’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从这个故事来看，所谓“以《三百五篇》当谏书”，固然涉及《诗经》具有一定的启发、认识、讽谏作用，但主要还是王式对自己的死罪所作的辩解，靠诡辩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人们可以反问，如果《三百五篇》真的可以起到谏书的作用，那末，昌邑王就不会如此荒淫无道，也不致于在登台后很短的时间里就被废除了。

上述四个“范例”，都不能证明“通经”可以“致用”，也不能证明“治一经得一经之益”，恰恰相反，只能证明“以经术饰吏事”通常是瞎胡闹。不过，这些例子至少也从侧面证明了经学确实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汉代直到清末，从学校教育、科举考试、人才选拔直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几乎都是以经学为重要标准和基本内容。这就无怪乎对经学会出现种种的神化和夸张。这里，顺带对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作一辨析。这是指的宋朝宰相赵普的事。据《宋史·赵普传》：“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发篋。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又据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一《论语》条云：“杜少陵诗云：‘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贾。’盖以《论语》为儿童之书也。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盖亦少陵之说也。’太宗尝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普之相业，固未能无愧于《论语》，而其言则天下之至言也。”这两条材料，大概就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之所出。但赵普是个“寡学术”，水平不高的人，在当时就被人看不起。他虽在太祖、太宗两朝为相，但其人并非定国之雄才、治世之能臣。元人刘因《白沟》诗云：“赵普元无四方志，檀渊堪笑百年功。”宋王朝的积弱积贫，边患不断，跟“赵普元无四方志”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罗大经为什么又说“其言则天下之至言”呢？章太炎也说：